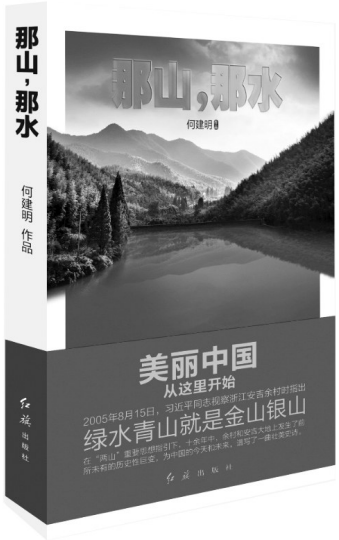


“两山”思想的文学读解

——《那山，那水》创作谈



□ 何建明

作为一名写了四十年报告文学的作家，我几乎涉猎过所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国家和时代进步的大事件，也走了许多地方，目睹和亲自记录下了许多精彩的中国故事。今年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收获：受浙江省委之邀，到了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阐发地——浙江的安吉县余村。不曾想到，弹指一挥12年，余村和安吉在习近平“两山”思想指引下，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我的新作《那山，那水》（红旗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是一部记录习近平“两山”思想诞生过程及安吉余村在“两山”思想引领下，结合本地特点，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走出了一条依靠“生态文明”建设带动大发展的报告文学。很幸运，作品在出版

后的短短时间里，不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获得了许多地区领导干部们的热捧。

文学是社会的生动反映，是人的情感的艺术表达。十几年前的安吉余村，正处在发展朝何处走的一个重要关头，是依然沿着传统的“靠山吃山”、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老路子，还是摒弃旧观念、拓展新思路，走一条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道路？当时集体经济暂时面临下滑、各种矛盾凸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余村，在听取汇报和洞察到干部们的内心忧虑后，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清晰和明确地指出：“你们讲下决心关掉矿山，这是高明之举！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他与当地干部们更深入讨论有关发展方式时，又谆谆教导：“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有所得有所失。在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时候，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据当时与习近平面对面交谈的余村老支书鲍新民回忆说，为了解除余村干部对依靠生态发展经济信心还不太足的疑虑，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和其他干部：生态资源是你们最宝贵的资源，搞经济、抓发展，不能见什么好都要，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迷恋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习近平进而说，你们安吉这里是宝地，离上海、苏州和杭州，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逆城市化现象会更加明显。你们一定要抓好度假旅游这件事，把山恢复青了，把水变绿了，自然而然就会有人“送钱”来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沿

着当年习近平指引的方向，一直坚持以生态建设促经济建设的发展思路，如今山早已青了、水早已绿了，村庄的每一个地方也都变美了，美得不仅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上海、苏州、杭州人往我们这儿跑，而且许多外国人都慕名而来，让我们的百姓口袋装得满满的。”鲍新民老支书给我讲了一串串生动精彩的由开山挖矿到恢复绿水青山，再到统一整治设计更美的环境，最后实现处处“金山银山”的过程。听后令人感慨万千。

生命之树常青。《那山，那水》正是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以余村人的故事，讲述了习近平在何种情形下阐述了“两山”思想、余村人又如何按照习近平的“两山”思想一步一步的实践，获得了“生命之树常青”和“生命之树”上长出“金山银山”的生动故事。今天的余村和安吉，山是景、水是诗，人是诗中景、景是诗中画。文学是以精美故事和形象生动的情节，将读者导入一种现场感和形态之中。它比一般的言说，更接近情感和心灵的深处，因而也更能直接地让人们记住和体会到什么理论是有用的、管用的和见得效的真理。习近平的“两山”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创新，具有朴实而深刻的哲学意蕴。正如他曾说过的那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是一句大白话，但包含了我们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深刻道理，也渗透了人类对大自然敬畏和尊重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行动。这样的思想和真理，从理论层面阐述还可以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或许成为教科书。然而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的故事和情节描写，把伟大的真理和深邃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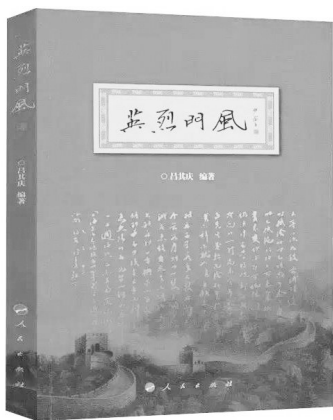
论，化为人民看得见、体味得到的画面，让我们身临其境，仿佛与叙述的对象在一起共享其诗其歌、其情其坎。

《那山，那水》中记述“两山”思想的诞生过程，仅用了两千余文字，但描写这一思想如何被实践证明，则用了十几万字，记述了安吉人民十几年实践的漫长过程。这就是文学对重要理论进行阐述的一大特点，它需要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人与事，对应于这个理论和思想，对应于真理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这过程，既是对真理和理论的正面论证，同时也是作者学习和体会“两山”思想的过程。通过对安吉余村及浙江其他地方的采访、调查和实地观察，让我感到巨大收获和惊喜的是：习近平的“两山”思想太值得我们去认真深刻地学习与领会了，因为从安吉及浙江的近十年变化中，我看到了“两山”思想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从余村甚至今天的整个浙江大地上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大家可以得出与我同样的结论。

文学的力量，多数时是激情之下催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如果从文学上理解，它也是一句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文学语言。《那山，那水》则通过习近平总书记、余村百姓与干部、安吉人民这几十年来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展现，让“两山”思想成为一种可触摸的、闪烁光芒的真理之花，绽放在全中国，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两山”思想的另一种“读本”。

书海泛舟

□ 赵晶



读《英烈门风》有感

□ 赵晶

家风是一个家庭积淀和传承的处事方法、言行规范和价值观念，是家庭文化的凝聚。吕其庆博士的《英烈门风》（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开始阅读，废寝忘食地读完了此书，产生了诸多情感共鸣。

以书寄情缅怀英烈。记得2015年中央电视台就有“重读抗战家书”的节目，其中抗战英雄们的一封封家书令人感动。而今《英烈门风》通过英烈后人的追思真实地呈现英烈肖像和门风正气。这既是对历史的铭记与反思，又是对英雄的缅怀与纪念。为了“主义”而英勇牺牲的李大钊、“为抗战发出怒吼”的洗星海、“震惊旧世界的一声惊雷”的张太雷、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夏明翰、“为了救可爱的中国甘愿赴汤蹈火”的方志敏、“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一切”的刘志丹、“反满抗日”的赵一曼、“战死沙场以博一快”的袁国平、被毛泽东称为“‘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左权将军、抗日英雄杨靖宇、“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独臂将军”贺炳炎、著名抗战将领王孝慈、“兴国首任县委书记”胡灿、“双枪芙蓉”贾春英、“英雄母子”马本斋、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家庭”“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一张张朴实生动的老照片，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封封净化灵魂的家书、一幅幅厚重情感的寄言语，再现了英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令人难忘的抗争历史，再现了英烈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再现了英烈们家国天下、精忠报国的门风。

以腿丈量体悟门风。本书作者打破家风研究的传统范式，躬身实践，北上南下寻访革命前辈及其后人，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自己的采访手记，研究革命先烈家风家训家书的门风传承，贴近生活、贴近事实、贴近人情，创新了传统家风研究范式，拓展了家风研究空间，形成了独特的以英烈家风群体为对象的家风研究范式，是英烈家风研究成果的补白之作。他采访了百老红军王定国，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张大雷之女张西茜、任弼时之女任远芳、方志敏之女方梅、夏明翰之女夏芸、左权之女左太北、陈潭秋次子陈志远、刘志丹之女刘力贞、洗星海之女洗妮娜、毛泽东外孙曹耕山、赵一曼孙女陈红、杨靖宇之孙马继民、贺炳炎之子贺雷生等。他将自身的情感寄托在行走之中，将感情升华于文字之中。我作为一位普通的读者也被作者笔下英烈们为了中国革命前途，不怕牺牲

的坚定的家国情怀所感动。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书中提及方志敏写过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国载五物，松柏翠竹白梅兰。”他把祖国比作母亲，爱祖国的“佳山水”，并用“松、柏、竹、梅、兰”为他的五个子女起了名字。方志敏与妻子缪敏的婚礼誓词：“为了救可爱的中国，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俩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还有夏明翰在狱中写给夫人郑家驹的信：“抛头颅，洒热血。‘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夏明翰女儿的名字）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志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以心传承坚定信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再也没有比生死抉择更沉重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革命英烈经受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不惜流血牺牲？正如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这些革命英烈后代，他们是父辈崇高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的直接传承者，是老一辈革命英烈门风的真实呈现。在一次次与革命英烈后代的对话中作者找到了答案：“信仰是引领他们的天，人民就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斗，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要把革命英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英烈门风内化到党员干部头脑中，用理想信念为精神“补钙”，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书而思

□ 李长庚

《政论》中的治世良方

□ 李长庚

《政论》成书于东汉末年，为崔寔所撰，至北宋时全书散佚，部分内容保存于《后汉书》《群书治要》《意林》等文献中。清人严可均加以整理，收入《全后汉文》。《政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东汉末期社会腐败动乱的现实提出革除弊政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有补偏救弊现实意义，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德法兼治”。东汉到了桓帝继位时期，“政令垢玩，上下怠解，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社会风气败坏，人心奸诈虚伪，东汉政权岌岌可危。如何匡正时弊？崔寔认为：要济时拯世，救弊扶正，就要“量力而举，度德而行”，根据当时社会风气的现实情况，“宜参以霸政，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他认为人主和朝廷没有尧舜一样的品德，所以变革不能完全效仿上古尧舜时期理想的“德治”社会，要走“王道参以霸政，德治兼法治”的道路。“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他举例说，汉宣帝“严峻刑

法”，结果海内肃清，天下太平；汉元帝“多行宽政”，结果埋下了汉王室走向衰落的祸根。当然，他并不反对“仁政”，但认为乱世与治世的治理方法应有区别。他说：“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国的方法，如同养生，身体健康则致力保养，有病则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和石针，道德教化，是维持太平世道的米饭和肉食。用道德教化来清除残暴和腐败，就是用米饭和肉食来治病；用刑罚来管理太平世道，那就是用药物和石针来保养身体。治理国家要审时度势，与世推移，应变趋时，不泥于古法。

“严惩奢靡”。崔寔批评了当时无节制的社会风气，阐明了奢靡的危害性，主张通过严格的制度惩处奢靡之风。他分析了奢靡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影响人的性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食，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不控制则欲望无止境。二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社会崇尚奢侈，华丽无实用的东西被人看重，而农业生产遭到轻视。“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官女投杼而刺绣”“躬耕者少，末作者众”，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歉收。三是影响丧葬习俗和孝道，败坏社会风气。有些人下葬要使用贵重木材的棺材、墓中多埋珠宝，杀牛祭奠，唱挽歌，修筑高坟，建大庙；有些

人盲目攀比，减省对于父母的供养，大量购置办丧事的物品；有些人贪图办丧事风光的虚名，不顾老人的饥饿寒冷；有些为了大办丧事，耗尽家财。奢侈之风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大多数人沉湎其中而靡费家资。从前的圣王远虑深思“惠民情之难防，忧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取信于民”。崔寔认为东汉官府常常失信于民，造成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秩序混乱。他说，官府对待百姓，多有不合理之处。比如，役使工匠，从民间集市招工，往往设计诱骗他们，东西做成后，却不给工钱，故意拖欠。那些工匠“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阙告哀，终不见省”。不能

及时要到工钱，他们就不愿意做工。官府强行去抓起来威逼利诱，他们就消极怠工，弄虚作假，做出来的器械就低质粗劣，不合用，白白浪费了财物。老百姓上行下效，官府“罚则不恕，不罚则不治”。这样一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安固长吏”。意思是制定用人政策，稳固基层官员。东汉吏治腐败，民怨沸腾，朝廷屡次下达“恩泽”之诏，垂恤民之言，但是法度条令有失养民的道理，以至于“劳思而无功，华繁而实寡”。崔寔认为东汉末年用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任期太短，任免调动频繁。尧舜时期，每三年考核官吏政绩一次，三次考核后决定升

降，以此来“表善简恶”，使得官员尽心尽力。汉代也是三年考核一次，但是东汉末年时，一年之中，郡中换了几任太守，如“云扰波转，澹澹纷纷”，即“走马观灯”式地换，让“吏民疑惑，不知所谓”。急功近利的短期考核制度，迫使一些官员急于求成。办事不择手段，作风粗横蛮暴，这样一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崔寔建议适当延长基层官员考核的期限，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性、施政的连续性。第二个问题是“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网刻于下职”。对朝廷重臣不用重刑，对基层官员严法苛责，以至于下级官员争着揭发别人的小毛病，吹毛求疵，有些甚至诋毁污蔑忠良。崔寔认为应该有安定基层官员的措施，“原其小罪，阔略微过”，让他们安心做好地方治理工作。

干部国学苑

□ 李长庚